

摘要

孟子身处战国时期，将儒家思想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关于人才培养和任用方面，孟子基于儒家传统，在原有推举贤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养贤的主张。这一主张既是对儒家人才思想的推进，也是一次整合创发。既是对战国时期礼贤下士之风的展现，也彰显着儒家贤能政治的理论内涵。孟子养贤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仁政思想的理论延伸。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孟子养贤思想是对孟子思想研究的深入推进，也丰富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儒家在尧舜禅让理想以及三代重德传统的大背景下，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一政治主张可称之为贤能政治思想。然而这一举措在儒家内部亦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孔子之时是举贤才，在孟子之时则深化为养贤才。孟子养贤思想具体表现为政治养贤和礼制养贤两个方面。其中政治养贤又分为尊贤和用贤，是孟子养贤思想的制度保障；礼制养贤又分为礼贤和育贤，是孟子养贤思想的重要方法。孟子通过详细阐述国君养贤方面的理论，深刻表明了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德高于位的理论观点，在国家治理方面重视贤才的理论设计，在教育思想方面培养贤人的理论指向。孟子养贤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贯穿于孟子思想的各个方面。

孟子养贤思想对于后世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其一，在国家体制中突出了贤才的重要作用。孟子所凸显的贤才是具备儒家君子人格的知识分子。他们固守儒家仁道精神，在德与位、义与利、王与霸等方面选择前者，始终站在道义的一面。他们的人格特质深远的影响了后世的士大夫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构筑了中华文明的伟大民族精神。其二，孟子养贤思想继承了儒家贤人政治的政治理念。贤人政治是以贤者来治理国家，在儒家思想中，贤人在位则推行仁政，以民为本，实行国家庶富教的养民之策，进而达到国家强盛的目的。这一政治理念影响了中国两千年来的治理格局。其三，孟子养贤思想在培养贤才、选用贤才方面给与后世以重要启示。在中国历代选用人才方面，先后出现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以及科举制。其实是对孟子养贤思想理论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具体实践。孟子养贤思想蕴含着孟子在政治、教育乃至哲学层面上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其在这些方面上的主张将会进一步在现代社会给予人们以新的启示，并将会对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产生重要作用。

关键词：孟子；养贤；儒家；贤能政治

Abstract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Mencius enriched and deepened Confucianism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 Regarding the cultivation and appointment of talents, Mencius, based o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cultivating the virtuous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idea of recommending the virtuous. This proposition is not only a promotion of Confucian talent thought, but also an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It is not only a demonstration of the style of the virtuous and corporal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but also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Confucian meritocracy. Mencius' thought of raising the virtuou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it is also the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his thought of benevolent government.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research, Mencius's thought of raising the virtuous is an in-depth promotion of the study of Mencius' thought, and it also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as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Confucianism put forward its own political proposi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Yao and Shun's ideal of renunciation and the tradition of emphasizing virtue in three generations. This political proposition can be called political meritocracy. However, this move also took different forms within Confucianism. At the time of Confucius, it was "to raise worthy talents", and at the time of Mencius, it was deepened to cultivate virtuous talents. Mencius's thought of cultivating virtuous people is embodied in two aspects: political cultivating virtuousness and ritual system cultivating virtuous men. Among them, the political cultivation of the virtuous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the respect of the virtuous and the use of the virtuous, which is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Mencius's thought of cultivating the virtuous. The ritual system of raising the virtuous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ritual and nurturing, which i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Mencius's thought of raising sages. Mencius, by expounding the theory of the monarch raising the virtuous, profoundly expresses the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that morality is higher than the superiority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the minister, the theoretical design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virtuous talents i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cultivating virtuous men in educational thought. Mencius' thought of raising the virtuous constitutes a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which runs through all aspects of Mencius' thought.

Mencius's thought of raising the virtuous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later generations. First, i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alents in the national system. Mencius highlights the virtuous intellectuals who possess the personality of a Confucian gentleman. They stick to the Confucian spirit of benevolence and Taoism, choose the former in terms of virtue and position,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 king and hegemony, etc., and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morality. Their personalities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cholars and officials of later generations,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y have also constructed the great national spiri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econd, Mencius's thought of raising the wise inherits the political concept of Confucian sage politics. In Confucianism, when the wise are in power, they implement a benevolent government, put the people first, and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raising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which is rich and educated,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a strong and prosperous country. This political concept has influenced China's governance pattern for two thousand years. Thirdly, Mencius's thought of raising the virtuous has give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to later generations in cultivating and selecting virtuous talents. In the selection of talents in the past dynasties in China, there have been the inspection system, the nine-rank Zhongzheng system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fact, it is the further advancement and concrete practice of Mencius's theory of raising the virtuous. Mencius's thought of raising the virtuous contains a series of Mencius' ideological propositions on th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even philosophical levels. The propositions in these aspects will further give people new inspirations in modern society, and will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Key words : Mencius; cultivating the virtuous; Confucianism; political meritocracy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引言	1
选题缘由及意义	1
研究现状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4
不足之处	4
第 1 章 关于养贤思想的几个问题	5
1.1 关于贤字的考察	5
1.1.1 贤字义的流变	5
1.1.2 贤与能	6
1.1.3 贤人与圣人、君子、士的区别	7
1.2 孟子养贤思想的理论背景	9
1.2.1 尧舜时期任贤传统	9
1.2.2 三代时期亲尊传统	10
1.2.3 春秋时期明贤思想的兴起	11
1.2.4 战国时期礼贤思想的实践	12
1.3 孟子养贤思想的理论依据	13
1.3.1 贤重于能：儒家贤能思想的形成	13
1.3.2 德高于势：儒家道统思想的萌芽	14
第 2 章 孟子的贤人观	16
2.1 孟子对贤人内涵的界定	16
2.2 贤人的道德品质和基本要求	17
2.2.1 舜孝的形象	17
2.2.2 “志士”形象	18
2.2.3 射者“反求诸己”的形象	20
2.3 贤人的政治品质和基本要求	21
2.3.1 “不见诸侯”的形象	21
2.3.2 王者师的形象	22
2.3.3 孔子“圣之时者”的形象	23
2.4 小结	25

第 3 章 孟子的养贤观	26
3.1 孟子养贤思想的提出及其政治意涵	26
3.1.1 孟子养贤思想的提出	26
3.1.2 孟子养贤思想的政治意涵	27
3.2 政治养贤	28
3.2.1 尊贤：以位养贤	28
3.2.2 用贤：以信养贤	30
3.2.3 小结	32
3.3 礼制养贤	32
3.3.1 礼贤：以敬养贤	33
3.3.2 育贤：以道养贤	36
3.3.3 小结	39
3.4 孟子养贤思想的特点	39
第 4 章 孟子养贤思想的评价、影响及现代价值	41
4.1 孟子养贤思想的评价	41
4.1.1 正面评价	41
4.1.2 负面评价	43
4.2 孟子养贤思想的影响	45
4.2.1 积极影响	45
4.2.2 消极影响	47
4.3 孟子养贤思想所体现的贤能政治理念的现代价值	49
结语	51
参考文献	52
致谢	55
附录 A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56

引言

选题缘由及意义

孟子所处的时代正是一种诸侯混战、天下不宁的时期。各个诸侯国都想着做大自己的国家，在群雄中称王称霸。周朝共主的身份经过春秋礼坏乐崩的侵袭，也早已不为诸侯所在意。然而，要实现国家富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战国时期就涌现了一大批专门为国君兜售学说为业的人。这样的人大多出身卑微，但是富有智谋，对国家的兴衰具有一定的认识，能够提出合理的国家统治方法，这类人在战国时期可以统称为士。士阶层的兴起是时代产生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君主专制的社会，单纯依靠君主来统治诺大的中国，对其政权来说是十分不稳固的。于是，顺应着时代变迁，重视人才成为各国君主的施政策略，国君采取各种方式吸引人才的到来。同时，各类人才也积极进行知识储备，提升技能，在各国间进行游说穿梭。整个战国时期正可谓战乱征伐，热闹非凡。这样的时代背景促使形成了政治上霸道盛行和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孟子正是他们中的一员。

春秋时期的礼乐制度还未完全崩坏，孔子自觉担负着继承西周礼乐文化的历史使命，创立了儒家学派。儒家学说的核心就是西周时期所形成的“礼”和被孔子尤为重视的“仁”。儒学经过孔子及其弟子的传播逐渐影响开来，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可以称为儒家，每个个体都可以称为以儒学来安身立命的儒生。儒家在孟子之前发展衰微，孟子私淑孔子，认为孔子是自生民以来从没出现过的圣人，所以孟子以孔子为自己的老师，一生致力于宣扬儒家学说。与孔子相比，孟子提出了“仁义”的思想，将“义”上升到了与“仁”同等的高度。对“义”的强调是孟子思想的重要特征，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孟子确立了个体人格独立的思想。孟子认为，只要自身能够崇尚道德喜爱道义，那么就能够使自己安然自得而不受环境影响。穷困的时候坚守道义，自己就不会媚俗，发达的时候不背离道义，百姓就不会失望。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就可以称为贤人。第二，孟子将“义”植根于人性之中，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与生俱来的品质。人人都可以成为贤人。第三，孟子强调“义利之辨”。国家富强固然需要土地人力，但如果不是以正当的手段取得这些资源的话，即使国家一时强大但并不能长久保持。相反，孟子认为只有施行仁义才能使国家长久强盛。可以说这是孟子外王思想的体现。这些是孟子思想中十分鲜明的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将孟子的思想分为三个方面，人性论、修养论和政治学说。

对于孟子这几个方面思想的研究可谓是数不胜数，多如牛毛。如何能够切入孟子思想的一个方面，深入挖掘孟子思想的根基，并不是一件易事。本论文正是从战国时期重视人才这个特殊背景入手，分析孟子思想中的“养贤”思想。事实上，这个主题看似十分简单，甚至给人感觉没什么研究价值。但如果深入思考，我们仍可以确定这个题目的研究内容。首先，“养贤”涉及到国家体制，中国古代王权是和官僚系统一同运作的。怎样对待贤人是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课题。也基于此，中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关于重视贤才的政治经验。其次，历史又是具体的，每个朝代都有其时代特征，这又要求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真体会时代变化中的问题样貌。也就是说“养贤”在战国时期是如何表现的，在孟子思想中又是如何阐述的。孟子的“养贤”思想和战国时期的“养贤”思想有什么样的异同。除此之外，孟子“养贤”思想在其整个哲学思想中占有什么地位，体现了孟子哪方面的理论内涵。再次，孟子“养贤”思想具有什么样的理论影响，从大历史来看，孟子的“养贤”思想在后世政治运行中体现在哪些方面。最后，从研究意义上来看，孟子“养贤”思想在当下具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当下贤能政治成为一个学术热点的时候。以上就是本论文要着手阐述的几个问题。

对孟子的养贤思想进行发挥，可有以下意义：

第一，促进对孟子政治思想研究的深入，着重发挥孟子哲学思想中的贤能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孟子养贤思想的总体设计。第二，站在孟子哲学的角度看孟子对其之前哲学思想的理论发挥与创造。主要体现在孟子在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两方面的理论延伸与发展。第三，通过孟子养贤思想结合当下时代背景，可尝试提出几点政治启示。孟子的养贤思想是中国传统贤能政治的一个体现。在现今的中国社会，贤能政治和西方民主政治有一个争论，相应的贤能政治下的教育思想也是如此。如何更好的实现贤能政治的效用，是我们可以仔细思考的问题。而孟子的养贤思想，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路。

研究现状

目前直接阐述孟子养贤思想的文献并不多，而与之相关的多是关于先秦时期人才选拔制度、尊贤传统以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等方面。因此，本论文着重在这些方面进行分析，并尝试总结涉及到孟子养贤思想的部分。

在人才选拔方面，目前的研究十分丰富。这里着重介绍几篇较为典型的论述。王竹波在《“亲亲”、“尊尊”、“贤贤”——论殷商至春秋人才选拔观念的衍变》一文中着重说明在先秦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才选拔方式的衍变过程。这其中所论述的贤贤传统就是涉及到时代变迁时人们观念的转变，同时这也是儒家人才思想的一个来源。张兆凯在《中国古代人才选拔的制度化轨迹——论先秦儒家的

人才思想与选才原则》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儒家人才选拔制度的形成，并认为这是对西周时期世官制度的冲击。他详细论述了儒家贤能的标准和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文的研究。何爱霞在《先秦儒家的人才思想与当代人才资源开发研究》^①一书中介绍了孟子贤人思想的理论，并且从价值属性上对贤人进行了分类。秦国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才价值观的演变》一文中指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价值观演变过程，这个视角正是思想史的视角。

在先秦尊贤传统方面，涉及到的研究亦是十分众多。刘良海在《论先秦儒家的尊贤思想》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儒家学派尊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他认为自孔子开始，尊贤思想逐渐成为儒家政治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并且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重要影响。范浩在《先秦儒家尚贤思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一文中说明了先秦时期儒家尚贤思想的发展演变。其中他介绍到孟子的尚贤思想，并认为孟子的尚贤思想不仅有尊贤的意涵，这对于本文的研究很有启发。台湾学者黄俊杰在其早期出版的学术著作《春秋战国时代尚贤政治的理论与实际》一书中较为全面的分析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家的尚贤理论，认为儒墨对尚贤政治持有积极拥护之态度，道家则持怀疑、否定之态度，而法家持有保留态度。^②该书还分析了尚贤政治在实施上的困难及差距乃至尚贤政治对春秋战国变局的影响，这给本文的研究带来较多的启发。虽然本文主题为养贤思想，但亦是在尚贤思想的前提下进行论述。

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方面，学者们常常结合中国古代士人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发展历程相研究，试图从中分析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模式。葛荃在《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所要阐述的就是这个内容。该书以士人为论述主体，详细分析了士人在政治中所起到的角色，以及中国传统社会对士人的期许。我们认为这对研究士人的社会角色以及行为表现具有十分有价值的意义，并且在论述中国整体的政治思想方面有着独特视角。阎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士大夫角色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他指出尊贤是先秦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王杰在《先秦儒家政治哲学论稿》一书中阐明了孟子政治哲学思想中的六个辩题，这一论述十分精要。陆妮和戎辉兵在《试析先秦儒家“贤人政治”思想》一文中阐述了先秦儒家的贤人政治思想，这是明确以贤人政治概述儒家政治思想的一项重要成果。其文章中提出的贤人政治思想的逻辑分层对于儒家政治思想的理论具有很好的解释作用。李东阳和贝淡宁在《先秦贤能政治观的形成与嬗变》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先秦时期贤能政治的发展形成过程。其中对贤和能字的分析十分具体和精细。

总之，在对孟子养贤思想进行研究的同时，本文关注了不少中国古代政治哲

① 何爱霞：《先秦儒家的人才思想与当代人才资源开发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② 黄俊杰：《春秋战国时代尚贤政治的理论与实际》，台北：问学出版社，1977年，第99页。

学的内容。涉及到的研究不仅众多，而且对于俯瞰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乃至中国整个政治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研究扩大了本论文的写作视野，促进了研究的进程。

研究思路与方法

在研究思路和文章架构方面，本文共分为四章论述。第一章首先从贤字着手，分析贤字字义流变，以便理清贤字内涵。其次，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孟子之前的政治传统，作为孟子养贤思想的理论背景。最后简要从儒家政治思想的特点上说明孟子养贤思想的理论依据。第二章，本文着力阐述孟子的贤人观，以便明确养贤之对象。第三章是文章主体部分，在深入《孟子》文本的基础上，竭力阐发孟子的养贤思想内容及其特点。第四章则是分析孟子养贤思想的评价及其影响，包括正面评价、负面评价以及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最后站在现时代政治的角度简要阐述孟子养贤思想所体现的贤能政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在研究方法上，第一，本论文在立足于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采取思想史和文献结合的方法入手。也就是说，本论文要依循思想发展脉络之纵向过程和文本阐述之横向过程交叉的取径入手。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思路不会跑偏，同时使研究更加理论化。第二，本论文仍需要参考现阶段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最新成果。只有跟进最新相关研究成果，才可能更大的发掘出问题的研究价值。在这一方面，本论文将尽最大可能参考各种相关资料，努力使论文的深度得到提升。第三，本论文因为接近孟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所以在必要时将会引入一些政治概念，而且更多的是以政治学视角展开论文写作。当然，所谓的政治学视角依然是立足在中国传统政治的主体上展开。

不足之处

本论文力图详细梳理养贤思想在上古尧舜时期到孟子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并站在更高的角度即中国古典政制的角度上来说明孟子养贤思想的政治意义，由此展现儒家在政治理想上的制度构想。本论文的不足之处也正是在于这个地方，由于政治哲学问题牵涉面太广，更是学界研究重点，很难在这个问题上集中方家研究成果做出突破，这也是本人学力不足的原因。

第1章 关于养贤思想的几个问题

1.1 关于贤字的考察

1.1.1 贤字义的流变

关于“贤”字，段玉裁说：“（贤）多财也。财各本作才。今正。贤本多财之称，引伸之凡多皆曰贤。人称贤能，因习其引伸之义而废其本义矣……贤，多也。从贝叕声。”^①简言之，段氏此说认为“贤”从其本意上来说具有“多”的意思，而贤能则是其引申义。《说文》认为贤字从贝，段氏解为多财。顾颉刚从其说，并指出是商人贵富的原因。至于贤如何由多财演变为贤能之道德义，顾氏认为是由于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原因，财富不再成为区别人与人之间的标准，由之而来的是对人们行为的关注，由此贤就有了道德义。^②

这种解释看似十分有道理，并且顾氏将贤的内涵解释为才能和德行。但也正如其本人所说只是提出初步的看法。杨树达对贤字也有研究，他认为贤可以从字形上分析，他将贤字分解，并从“叕”入手，逐渐在《说文》中找到对应的字。最后他认为贤和能是同义的，都有坚强的含义。至于贤为何也有财富的含义，他也归结为社会发展的缘故。^③杨树达的这个解释将贤的字义向前推了一步，比起顾颉刚的更具有溯源性。

高华平结合出土文献从贤字字形的变化上分析其含义，他认为贤有三种写法，并分析了三种写法的含义。这三种写法分别是：以“叕”为“贤”；以上“叕”下“贝”为“贤”；以上“叕”下“子”为“贤”。^④这三种写法分别对应了三种含义，分别是战争中力气大的人；财富多的人；有道德的人。这三义正好综合了顾颉刚和杨树达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贤字含义的发展演变。

韩伟涛在其硕士论文中详细研究了贤的文字流变，以及贤人的含义演变。他说：““贤”字字形下方的形旁是后起的，与其本义无关。因此如要对“贤”有清晰的认知，需要对“叕”做出讨论。”^⑤经过对“叕”字形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认为“叕”原始字义应该看作是战争之中的取目取耳之类的动作。至于贤如何发展为贤人所代表的才德义，他认为“贤”与“叕”有密切的关系，由此他一方面说明许慎所说贤有多多的本义其实是引申义，另一方面说明了贤的观念是逐渐演变的。不过，相对上述几位学者的研究，韩伟涛将贤与人结合，也研究了贤人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79页。

② 中国哲学编辑部编辑：《中国哲学》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94、95页。

③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6、37页。

④ 高华平.从出土文献中的“贤”字看先秦“贤”观念的演变[J].哲学研究,2008(03):71-76.

⑤ 韩伟涛.先秦“君子”“小人”“贤人”“淑女”观念演变研究[D].湖北省社会科学院,2020.

观念的发展演变。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入手，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认为贤人的观念可分为新旧两种情况。他认为“旧贤人”观念经历了从战争文化到等级意识再到“富有贤人”的变化。而“新贤人”的观念则是经过社会结构改变以及知识分子的提倡，从以富有为贤转变为以才德为贤的普遍义。

根据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贤的本义是战争中的动作，而后逐渐有了表示以力量大为贤，以财富多为贤已经以道德品质为贤的含义。这是我们研究孟子养贤思想所要说明的地方。

1.1.2 贤与能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贤的含义最后发展为贤人所具有的才德，后世一般也用贤能表示。（此时贤特指道德义）不过这也表明，贤具有两种内涵，一是道德之贤，一是才能之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不同的流派对贤人有着不同的要求，这也就造成了贤的道德义和才能义出现了不同偏重，这一般与各家的政治诉求相关。针对于此，我们需要分析不同学派对贤和能的不同偏重，以了解贤字不同的使用情况，同时也说明各家的政治主张。

在《论语·子路》中，仲弓问到如何为政，孔子提出“举贤才”^①的主张。这里的贤指贤德之人，才指有才能的人。可见孔子是贤能并举的。孟子发挥了孔子的这一主张，提出“尊贤使能”^②。也就是说，在儒家这里，贤有两义，并且它们不可或缺。但是，在整体的政治理念上，儒家更为注重的是德政，如“为政以德”^③。孟子进而将德政解为仁政：“行仁政而王”^④。也就是说，儒家并不排斥对有才能之人的使用，所以要并举同用，但是这里面有个区分。孟子对此进行了说明，他认为要让仁义之人处于高位。^⑤也就是说相比有才能的人来说，有道德的人要在高位上，这样才能保证仁政的实施。这里，孟子明确了贤德之人和贤能之人的不同职位，是对其仁政理想的具体规划。所以，我们可以总结说明在儒家观念中，贤能是并举的，但是贤要重于能。

相比于儒家的贤能并举，墨家也主张贤能政治。所谓“尚贤使能为政也。”^⑥只不过，墨家这里的贤之内涵是能的含义。有学者指出：“墨子的《尚贤上》虽然提到‘贤良之士厚乎德行’，但将贤良之士比作‘善射御之士’，表明其‘贤’更多的是指向射御之类的良‘能’。”^⑦由此，我们认为与儒家相比，墨家的政治主张虽然也是贤能并举，但是其贤的含义已经转化为能，所以其政治主张其实

①（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3页。

②（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20页。

③（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页。

④（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2页。

⑤（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58页。

⑥ 张永祥，肖霞译注：《墨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8页。

⑦（陈来，李存山，陈卫平，秦彦士，杨武金.儒墨关系的现代诠释(笔谈)[J].文史哲,2021(04):13-40+166.）

是要尚能。

法家的政治主张是以法治国，但也主张举贤：“举贤而任之。”^①不过，正如墨家一样，法家所谓的贤也是有着功利主义的倾向。其所指的贤也多是指能。而且，法家是反对儒家的德治的。高华平指出：“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的“贤”观念的根本特点，从“德”的方面讲，就是对君主忠心耿耿，没有任何私心私利；从“才”的方面讲，就是要具有立功立业、守法办事的才能。”^②所以，法家的贤是以维护君主专制为中心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法家是贤能并举，贤能并重。

所以，我们认为贤在后世的发展演变体现为两种情况，其中表示才能义的能与贤最初表示战争中有能力的字义相似。这说明，贤的最初义并未完全消失，只不过逐渐被只具有表示才能的能所代替。这从一方面说明了贤和能的紧密联系，同时也说明了贤与能在适当的事情下可以相互转换。而在后世的使用中又因为使用者的不同倾向而采取不同的含义。甚至出现了墨家所谓的以能为贤的表达，这种观点与其理论主张密切相关。如以能为贤既反映了贤的原始义，也反映了墨家崇尚原始民主的思想风格。相应的，儒家所使用的贤与能分别清楚，虽然儒家并不反对能，但贤更多被提倡。这说明了儒家吸收贤的道德义，表达了其对西周时期崇尚道德的思想。儒家也正是以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为理想的。由此，我们就能从贤与能的使用情况看到不同学派之间的思想主张，甚至能够判断这种思想主张在不同时代的发展情况。

贤与能更多被用来表示人的品行，而将其应用在政治领域就成了一种政治主张。政治本身即是一种人的行为在国家层面上的放大。以什么样的人来从政，其所出现的政治局面就是会反映这个人相应的品行。贤能之人从政，那么政治就是一种贤能政治的局面。而正如上述所说，贤能因其有着不同的字义，于是也就体现出不同的政治风格。这是我们尤为强调的一点。当然，我们主要针对儒家的思想，所以即从儒家的主张来看贤和能。

1.1.3 贤人与圣人、君子、士的区别

上面我们分析了贤字的字义和用法，这里我们主要说明贤人和儒家文献中出现的圣人、君子以及士等概念的区别。在儒家文献中，出现了很多指称人的称呼。其中圣人、贤人、君子、士是常常出现的。但是，这些指称一般都蕴含着儒家的道德人格意涵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都是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人格。但是，我们仍要做具体的区分。

圣人在儒家的观念中一般指尧舜，如“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大哉，

① 张觉等撰：《韩非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2页。

② 高华平.从出土文献中的“贤”字看先秦“贤”观念的演变[J].哲学研究,2008(03):71-76.

尧之为君也！”^①在孔子看来，尧舜的德行伟大崇高，这正是圣人的表现。孟子中出现了更多的“圣”字，这说明孟子更加重视对圣人的论说。如他说：“圣人，人伦之至也。”^②也就是说，在儒家看来，圣人是道德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或者说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当然，儒家也有着政治追求，他们所希望的圣人即是德行崇高之人，亦是有着完美治国才能的人。如孔子认为一个能够厚施于百姓的人不仅是做到了仁，而且还可以称为圣。^③这说明了儒家所谓的圣是兼有崇高道德和治国才能的人。并且这一思想一直贯穿儒家思想始终，说明儒家的政治期许一直以圣人为榜样。

相比圣人来说，贤人更多指称现实中德行优秀的人。如“贤哉回也！”^④孔子夸赞颜回德行修养好即用贤来说明。《孟子》中的贤更多从其德性来界定，如“智之于贤者也。”^⑤孟子认为贤人具有明智的品质，这也是因为孟子更多偏重贤人政治德性的缘故。不过我们从此处可以看到贤字在儒家内部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德目。这表明贤不仅表示道德优秀的普遍义，而且还表示具体的德目。而且在表征具体的德目时会有不同的思想指向。如孔子所谓的贤用在颜回身上就不仅说明颜回的德行好，而且还有表明颜回的仁德义。同样，孟子这里以智来说明贤者，这就反映了孟子对贤人有着智层面的要求。贤人有智体现了一个人的是非判断能力十分清晰，那么在其从政上就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孟子这里以智来指称贤者表明了孟子十分重要的政治理念。

君子在儒家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最高，这已然说明君子在儒家道德人格中具有普遍义。如《论语》中君子就出现了 109 次。也正因如此，儒家对君子人格的论说十分繁多。如“君子不重则不威。”^⑥“君子不器。”^⑦等等。《孟子》中也是如此，如“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⑧相比于孔子从仁上界定君子，孟子将其向前推进，从人性上论说君子，并认为仁是人的德性之一。这更好的解释了君子的德行依据。所以，在孟子看来，君子不仅是德行高尚的人，而且还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人格。孟子认为，人性中的仁义礼智四种德目是本来固有的，只要人们发现它们并且以此为本心，那么人就能够成为君子。所以，相较于孔子来说，君子不仅是一个表现繁多的人格特性，而且是内在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属性。孟子的君子观为人们成为君子建立了理论上的基础。

上述所说的称号更多是指道德完成之人的人格，而相对来说士更多指还在朝

①（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2页。

②（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59页。

③（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8页。

④（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5页。

⑤（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46页。

⑥（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2页。

⑦（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8页。

⑧（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32页。

着上述人格努力修养的一类人，所以士在道德人格序列中是最低位的，因其是未完成状态。但是，除却道德意义来说，士还有很多含义。如士也指贵族阶级中的没落人员，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在社会变革中逐渐成为了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孔子正是这个意义上的典型代表，他的祖先是贵族，但是到孔子这一代已经没落了。同时，我们还会发现士是一个在各家都十分普遍的存在。换句话说，战国时期所出现的知识分子大都可称为士人。士当然也不仅指称知识分子，在职的武将亦可成为士。由此士也分为文士和武士。相比于武士来说，在社会中起到更多影响的是文士，所以文士就逐渐成为了士的主要表现。孟子也多次提到士，但是他所谓的士内涵也十分复杂。这说明孟子并未对士进行过多自己的界定，但是孟子仍希望的是士要努力成为儒士。

上述的分类正是在儒家思想的限定范围内进行论述，《论语》中又提到君子儒，这涉及到儒的起源问题。有学者指出，““君子儒”不再是那些从事“相礼”专门技能的术士之儒，他们由原来“掌六艺以教民”的“儒”标准，发展为具有良好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操的贤才，能提出治国方针大计和社会全体成员行为规范的准则，把原始巫术礼仪演变为标志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差别的典章制度。”^①由此我们又可认为相对于上述所说的圣、贤以及君子等人格范畴来说，君子儒更多体现了儒生所具备的一种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子所谓的贤人，更多的具有君子儒的内涵。不过，所谓的君子儒更多意义上是对儒者宽泛意义上的界定，而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儒者又有着细微的区别，在儒家内部亦是如此。所以，这里的界定更多是从一般儒学的意义上进行说明。在具体论述时，还需要深入思想家著作内部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当然，我们上述的说明更多的是为后文的书写做铺垫，以方便更好的理解本文行文的用词及其内涵。

1.2 孟子养贤思想的理论背景

1.2.1 尧舜时期任贤传统

如上述所说，崇尚贤能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常见的话题。在尧舜时期，荐举贤能就是转让天下的标准，这也称为禅让制度。

相传尧要选拔继承人，问四岳谁能胜任，四岳就向尧推荐了舜。舜被四岳推荐的理由是因为他事父母极孝。也就是说舜是因为德行高尚而被推荐。这说明了贤德在政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尧听从四岳的建议，然后开始考察舜。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舜，观察舜的德行，然后又委任舜官职，让其处理政务，考察其能力。经过考察，尧认为舜能够治理天下，于是将帝位让给了舜。^②与之

^① 葛承雍：《儒生、儒臣、儒君》，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页。

^② 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页。

类似，舜传位给禹也是依据贤能的标准。据《尚书》记载，在大禹推辞帝位时，舜说：“来，禹！降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贤。”^①这里的“惟汝贤”就是说只有你贤能。可见，贤能正是禅让制度重要的参考依据。除此之外，《尚书》中还提出了“任贤”的思想：“任贤勿贰，去邪勿疑。”^②这也从理论上说明了任贤不管是在君位传承还是在官员任职上都是一个主要的原则。^③

《尚书》是儒家的经典之一，这反映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尧舜禅让的事被儒家认为是推举贤能最重要的典型，这说明儒家以圣王治世看重的是圣王的贤能品质。当然，尧舜禅让之事在现实中也有反映。如《孟子》中记载燕王禅让的事情。^④燕王禅让的事情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尧舜禅让制度的影响力，并且说明人们逐渐对贤能表示了极大的重视。尧舜任贤使能的传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政治主张，我们依次论述。

1.2.2 三代时期亲尊传统

当我们将目光转到三代的时候，便能体会到一种真正国家的存在。即使在西周以前仍旧存在着众多的部落联盟，但是相比于尧舜时期的场景，三代以血缘世袭制为继承手段，保证了统治权力的稳固地位。由此，统治中心也就十分稳定，这正是国家存在的重要表征。当然，三代并非是相互之间没有区别。如《礼记·表记》言：“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⑤在宗教信仰上，夏商周差别就很大。但是，在以血缘标准传位的这一标准上，三代却是一致的。盖三代时期，由尧舜禹所开创的功业逐渐让人们意识到一种内在的因素在起作用，而这种内在的因素很显然就体现为一种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由是，三代时期所谓的德亦可称为是一种血缘之德。血缘世袭制也就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血缘世袭制的主要体现为父子之亲，如果说夏商二代还只是朴素的依据血缘之亲传位的话，那么，到了周朝这种世袭制就越发的精致了。周代殷后，吸取殷商统治的教训，重视道德之德的内容。但是，所谓的德更多体现为一种统治合法性的宣传。在周朝内部，确立的是体现尊尊之义的宗法制和体现亲亲之义的嫡长子继承制。所以，周朝相比于夏商二代，在血缘世袭制上并无实质变化。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提到：“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于家天下，立贤之利过于立嫡，人才之用优于资格，而终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藉而争之易生，

① 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② 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③ 《尚书》所述贤似乎贤和能并重，即道德与事功二者兼重，这也反映了尚书所谓的贤其实是从圣的角度来论说的。

④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29页。

⑤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4、1485、1486页。

其敝将不可胜穷，而民将无时或息也。”^①王国维的解释具有一定道理，由是我们可以说，三代时期所奉行的是以亲亲尊尊为主的贵族等级制。特别对于周代来说，这种贵族等级制被纳入周公制礼作乐的过程中。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贤在西周以前并不具有道德义，而只待春秋时期才出现道德义。

但是三代时期已有相应的官僚制度，如夏朝已有六卿，殷商已有师保，西周有三公等相应的职官。^②这期间并不乏人员的上下流动情况。但是，这种方式更多是一种荐臣方式，并且还是在西周君臣关系出现之后才更多体现出来。晁福林说：“总之，夏、商、西周时期已经出现的荐臣之事，是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西周时期的荐臣只是在中下级执事人员的层面上一个举措。其所荐者只是“臣”而非“贤”。”^③所以，即使在三代时期出现人员上下级的流动情况，也只是一种任用关系，并未对统治机构的地位造成任何影响。而所谓的“贤”也并未真正得到明确发展。

1.2.3 春秋时期明贤思想的兴起

由于西周王室的势力逐渐减弱，平王东迁以后，西周时期所奉行的世卿世禄制度开始出现松动，这就给贤能的崛起带来了机遇。贵族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贤能的重要性，由是春秋时期逐渐兴起明贤的思想。《国语·晋语四》中记载晋文公：“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耆老，礼宾旅，友故旧。”^④晋文公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于他而言，如果没有身边贤人的辅佐，他是不可能成功返回晋国继承君位的。所以，晋文公回国即位之后开始实施一系列治国方针，其中就包括“明贤良”。所谓的“明贤良”是指显明、荣耀贤良之人的意思。这种思想并非是特例，相反是一种贵族内部政治理性的觉醒。《国语·周语中》记载周王与大夫富辰的对话：“王曰：‘利何如而内，何如而外？’对曰：‘尊贵、明贤、庸勋、长老、爱亲、礼新、亲旧。’”^⑤可见，明贤思想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陈来指出：“如果说‘尊尊’、‘亲亲’是西周时代的主要原则，那么，在春秋开始的诸侯国日益剧烈的内外斗争中，更注意采取‘明贤’和‘尚功’，乃是势有必至的。”^⑥所以，明贤的思想是一种顺乎时代发展的产物。

当然，这种明贤的思想在初期时候仍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所明之贤主要指贵族内部之人。阎步克在谈到春秋选官制度时提出：“选官上‘爱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291页。

② 关于此点，可参看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③ 晁福林：《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9页。

④（吴）韦昭注：《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2页。

⑤（吴）韦昭注：《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⑥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97页。

亲”“昭旧族”“共旧族”每每与“明贤”“明贤良”“选贤良”并列，此实即“以世举贤”，举贤大致不出世族之内。”^①也就是说，对于官员的选拔，春秋时期仍旧在周代礼制范围内进行。这一方面说明了春秋时期周礼仍旧在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们思想的局限性。但是，到了春秋末期，孔子的出现逐渐打破了这种局面，将社会上出现的明贤思想大大向前推进。这就表现在孔子“举贤才”和“有教无类”的主张上。孔子认为要举用贤能之人为政，并且他将贵族教育推行到普通平民百姓身上，这就为普通人入仕打通了道路。孔子的这两个举措意义重大，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贵族阶级的限制，同时也标志着明贤思想的真正成熟。

在谈到孔子的贡献时，有学者指出：“正是孔子将以前的“明贤良”推进到自己的“举贤才”，终使“尚贤”扩展到士和庶人之中，并为以后墨子的“有能则举”、孟子的“尊贤使能”和荀子的“量能授官”作了历史的铺垫和先导。”^②孔子作为儒家的开创者，在对周礼的继承上，相应的也进行一定程度的损益。这说明儒家在最开始时并非是绝对保守的学派，相反，儒家思想自创立之初就有着与时俱进的发展动向。

1.2.4 战国时期礼贤思想的实践

如果说春秋时期的明贤思想已经体现了一种国家政治理性觉醒的话，那么，战国时期则是一种热火朝天的礼贤实践。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有相应的原因，礼贤实践的出现表明贤人的地位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从具体原因上分析，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各国已经意识到人才在国家竞争中的重要性，吸引人才的到来成了有野心的政治家重要的施政举措。第二，学术的下移已经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新兴阶层，这就是士阶层。“从孔子到孟子这一个世纪之中，士阶层的发展最为惊人。”^③一方面国家正急需人才，另一方面社会上已经形成士阶层并仍不断的产生人才。这就造就了各诸侯国竞相争取人才的局面。

在战国初期，最有礼贤意识的当属魏文侯。文献记载，魏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④这说明当时已经有统治者意识到礼敬贤者的问题。事实证明，礼敬贤者是十分重要并且有效的。魏国在重用大批人才的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得到了周王及各诸侯国的承认，而且成为战国初期实力较为强盛的国家。而由之所产生的影响便是战国开启了礼贤下士之风潮。继魏国之后，重用贤才的国家有鲁国、齐国、燕国等。这种礼贤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如任官授职、

①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7页。

② 罗华庆：孔子的“尊贤”并非“有等”[J].江汉论坛,1983(06):77-78.

③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页。

④（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58页。

纳为家臣、设立学宫等。士人的这些待遇可谓是登峰造极，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个朝代能够全方位的礼遇士人。在这些举措中，十分典型的就是将士人纳为家臣，这种方式也可称为养士，如所谓的战国四公子都十分善于养士。而所谓的养士其实又可称为养客。因为并非所有的士人都能够得遇明主，同时也并非所有的士人都是贤能之辈。所以，在士阶层庞大的数量中，有相当数量的士人是寄养在大夫家中的，这样他们的身份就是客。由是，社会上就出现了养客的潮流。事实上，士人依托贵族的形式皆可成为寄养。由是，所谓的礼贤亦可成为养贤。余英时在论述这一点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私门养客的制度化，正是和国君养贤的制度化平行的。这是古代知识阶层的历史发展的一个侧影。”^①当然，我们这里所要指出的是，余英时所谓的养贤正是证明了战国时期出现了养贤的实践活动。但是，结合本文研究主题来说，提出这个理论思想的却是孟子。

孟子养贤思想正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下形成，这反映了儒家已经开始关注儒家士人的地位问题。虽然整个战国时期各国都对人才有着极大的渴望，但是这其中所体现的却是一种极为浓重的功利主义思想。儒家士人的虽然也热衷于入仕，但是相比于那些能够为国家带来短期利益的士人，儒家士人当然略显逊色。这些也有待我们后文的论述。

1.3 孟子养贤思想的理论依据

1.3.1 贤重于能：儒家贤能思想的形成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在儒家思想中，贤是重于能的。而这就主要反映在儒家的贤人观上。孔子所重视的是人之仁德的培养，强调的是人之内在品德。但论语中也提到“学而优则仕。”^②所以，孔子的贤人观具有重要的政治指向。简言之，孔子所重视的德行培养与政治有着重要关系。而所谓的能，即是一种以德为政的政治能力。由此，儒家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德为体、以政为用的贤能思想。

在孔子的基础上，孔门后学较为强调个人的德性修养，认为达到贤人的水平也就具备了为政的能力。出土文献《郭店楚简·五行》谈到：“达诸君子道，谓之贤。”^③这里的贤其实和君子之德的内涵一致。而所谓的君子道，正是孔子所强调的以仁为核心的君子人格思想。可见，在继承孔子的思想上，仁是至为关键的内容。从德目的角度看，仁是贤人的必备品质。当然，仁又并非是贤人唯一的评价标准。在《论语》一书中，提到的德目有仁、孝、忠、信等，这些德目都是贤人重要的参考标准。不过，德目的具备也并非只是一种德性修养，其中还反映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8页。

②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7页。

③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51页。

了儒家之道。这种儒家之道不仅内涵着儒家理想人格，还内涵着儒家的理想政治。所以，我们又可说，儒家之道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存在。其在政的方面说，是能；其在教的方面说，是贤。但贤在逻辑上在能之前，因为只有贤人才有贤能。儒家贤能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以成立。

贤重于能并不意味着能不重要，贤有待于能的施展。只不过相比于能来说，贤为本。贤重于能的思想反映了儒家的价值理性。相比于其他各家注重能的工具理性来说，儒家的价值理性更加具有普遍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儒家之道为何能够持续存在于中国历史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子的养贤思想同样秉承了儒家之道，因而其也内涵有重要价值。

1.3.2 德高于势：儒家道统思想的萌芽

事实上，对于道德的强调已经说明了道德在现实政治中的衰微。由此我们甚至可以理解老子所说的：“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①孔子的思想中既然强调了仁，那就说明仁也是政治思想的核心。从现实政治来看，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德位的分离。而到了孔子之孙子思的时候，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德位已经分离到无可附加的程度。西周的礼仪制度也逐渐演变为一种只有外在形式的制度。各诸侯内部斗争犹烈，权力成为贵族内部关注的重心。由此在儒家便衍生出了德高于位的思想，亦可称为德高于势的思想。在儒家文献《孔丛子·居卫》中记载：

曾子谓子思曰：“昔者吾从夫子游于诸侯，夫子未尝失人臣之礼，而犹圣道不行。今吾观子有傲世主之心，无乃不容乎？”子思曰：“时移世异，各有宜也。当吾先君，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其道，不执礼以求之，则不能入也。今天下诸侯方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伋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故相诡，乃各时也。”^②

从这里可以明显的看出，强调儒者道德自尊成了儒者从政的必要手段。子思的方式就是有种轻视君位的傲主之心。这表明在子思心中，现实的君主是德不配位的，由之其君位就降低了尊贵的程度。这就反映出来儒家道统思想的萌芽，即德高于势的思想。

子思注重个人道德自尊的态度深刻影响了孟子，反映在学术上有思孟学派一说。^③这表明，孟子继承了子思的思想，《孟子》一书中多次提到子思亦可成为

①（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93页。

② 白诒钢译注：《孔丛子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103页。

③ 关于思孟学派，可参看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一个例证。在这个传承中，其实就包括了德高于势的思想。孟子养贤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表现也必然与此相关。事实上，孔孟之间是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士人在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时所寻求解决的治国之道，而这一切在孟子身上达到了一个顶峰。这就是我们本文所要继续阐述的地方，当然，我们所要凭借的路径正是孟子的养贤思想。

第2章 孟子的贤人观

2.1 孟子对贤人内涵的界定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孟子所谓的贤人是在儒家学说范围内界定的。因为在春秋战国之际，士的地位崛起，同时涌现出大量学派。不同的学派或利益集团对贤人都有自己的界定。以价值取向为标准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以功业为追求的智谋之士。这类人以辅佐国君称王称霸为目的，他们大多对现实政治有着深刻的认识，并有改革现状的能力。历史上这类人很多，比如管仲、商鞅等。这类士人因为具备异于常人的才智和能力，所以被国君急于征召，而且一般被国君尊为贤相。第二，以道义为追求的学士。由于教育的普及，大量的学派产生。不同的学派均有自身的价值追求，对“道”有着自身的理解，所以产生了儒、墨、道、名、法等学派。孟子所处即是以仁义为道的儒家学派。不过这类学士也不仅仅以讲论学说为业，很多学士都有政治追求和入仕志向。第三，以归隐为追求的隐士。这类士人不主张参与政治，过着隐居自在的生活。他们大多都对现实政治有着消极的看法，所以主张避世。如《论语》中提到的隐士就有长沮、桀溺。

上述的分类蕴含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于价值相合的人们来说，即可用“贤”来表达对同类人才的认可。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就会产生争端，这也是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如“孟子曰：‘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①孟子这里所称的“民贼”正是上述所谓的第一类智谋之士。在孟子看来，不以仁义之道辅政的大臣并非良臣，而是民贼。这也体现出儒家民本主义的立场。所以，我们的上述说明正是为了展示孟子对贤人的界定是以儒家立场为本的，其所具备的价值取向为仁义。也正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价值取向的不同所带来的重要变化。

具体到孟子自己的语境中，我们仍可分析孟子对贤人内涵的界定。孟子心中的贤人形象是以儒家仁义为主的儒者形象，这与孟子的政治观点分不开。孟子认为治国必须施以仁政，也就是以“王道”治国。孟子的“王道政治”主张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孟子身处的时代是战乱频仍的时代，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不仅造成礼坏乐崩的局面，而且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这在以民为本的儒家眼里是绝对不能出现的情况，所以在孟子看来，战国时代的国君实行的是“霸道”，自己出仕正是为了矫正国君的错误主张，劝其施行仁政。第二，孟子认为施行“仁政”是完全可行的。所以，只要国君从内心发掘仁心进而推扩出去，便能很顺利的施行仁政。孟子为施行仁政提供了一套十分简单有效的方法。第三，孟子认为

^①（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3页。

儒生在帮助国君施行仁政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孟子对贤人的界定也有着重要的政治向度。

综上所述，孟子对贤人内涵的界定包含着内外两个意涵，对内，孟子认为贤人要以仁义为本，对外，孟子认为贤人要能够辅佐君主推行仁政。所以，孟子的对贤人的界定我们也可用“内圣外王”加以概括。

2.2 贤人的道德品质 and 基本要求

在内圣方面，孟子所谓的贤人是注重道德修养的君子。在这一方面，孟子有着许多发挥。甚至在不同的语境中，孟子用不同的称号来说明贤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格特征。如果说在《论语》中，出现众多的“君子”一词可以指称贤人的话，那么，在《孟子》中则出现了除了“君子”之外更多指称贤人的词汇。统观《孟子》全书，可以指称贤人的词有“大人”^①“豪杰之士”^②“大丈夫”^③等。对此我们可以说孟子将儒家的人格形象进行了多方位的介绍，根据不同的语境对其所谓的贤人冠以不同的称号，这是孟子对儒家人格形象的一大发明。

当然，我们仍要说明孟子所谓的贤人具体都有哪些道德品质和人格特征，这需要深入《孟子》文本进行具体的分析。对于这一点，我们运用的方法是通过孟子所称赞的对象来看其观点。

2.2.1 舜孝的形象

《孟子》全篇中多次提到尧舜之道，这说明孟子对尧舜圣人人格的认同。但是，即使是尧舜那样的圣人，其品质仍有和普通人一样的地方。而最明显的一处就是孝德。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廩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大孝终身慕父母。^④

在这一段中，孟子给我们展示了大舜“终身慕父母”的大孝形象。大舜作为一个帝王，财富名利美色权力等等都不能使他解除忧愁，只有让自己的父母满意了自己才会开心。舜的这种品质看似一般，但是却将孝做到了极致。舜同样是人，在其人生的不同阶段会面临不同的喜好，但是舜从始至终都把对父母的孝放在第一等位置，这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父母生育儿女，父子之间的亲情是人世间最重

①（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72页。

②（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9页。

③（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48页。

④（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3页。

要的情感。大舜作为儿子终身仰慕父母，说明他从始至终都在想着回报父母，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与父母无关，只是大舜自身的行为。但是大舜能够自觉的热爱自己的父母，正是儒家仁心的表现。“孝”在孔子那里就被提倡，“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①经过曾子的发挥孝逐渐成为儒者典型的人格特征。在孟子这里亦是如此。在《孟子》文本的其他地方，孟子曾引用曾子的话来说明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②所以，孝是孟子一贯提倡的道德品质，未曾改易。只不过孟子这里通过说明帝舜的“孝”更加凸显了“孝”作为贤人人格特征的重要地位。

然而，我们仍要对此进行论说。与孝相比，仁同样是儒家所提倡的。甚至说儒家思想最根本的是“仁”。所以，我们这里要辨析一下仁与孝的关系。或者说一个孝的人是否能够仁。《孟子》有句话很著名：“亲亲，仁也；敬长，义也。”^③这里孟子所说的仁很明显是从孝亲开始的。也就是说能够亲孝父母，那就是有仁德。结合上面所说，大舜终身都思念自己的父母，那他一定是具有仁德的人。这样看来，似乎一个人能够做到孝那么他就是仁人。目前学界在论述仁孝的关系时，有诸多说法。如认为仁孝一体^④，亦有认为仁孝二本^⑤。从《孟子》自身的语境中，我们认为，一个人孝，就是能够亲爱自己的父母，那么这个时候他是具有仁性的。而不必说他一定为仁人。事实上，做到仁是需要逐渐推扩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⑥一个贤人首先要能够亲爱自己的父母，然后才会亲爱百姓，进而才会亲爱万物。亲爱自己的父母是起始，我们这里以舜为例来说明贤人的道德品质，正是要说孟子的贤人观中首要的是孝，进而才可能是仁。这正是在于仁并非是一个静态的德目，而是以孝为根基进而再展现出来的德性。所以这里不仅也在说明贤人要孝，同时也涵盖着贤人仁的德性。

2.2.2 “志士”形象

孟子认为，作为儒家的学者必须要能够立定志向，只有立定志向才能行事不移。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⑦

①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0页。

②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35页。

③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31页。

④ 吴凡明.论儒家仁孝关系的内在逻辑[J].伦理学研究,2016(05):25-31.

⑤ 田丰.论仁孝二本[J].哲学研究,2020(11):66-76.

⑥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40页。

⑦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36页。

这里的“尚志”，朱熹注为“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当为农、工、商、贾之业，则高尚其志而已。”^①这里的“士”是一个特殊阶级。与农、工、商人相比，士没有具体的事情可做。但是，孟子认为士应该有自身的道德要求，并以此为自己的事业。而这正是成为贤人君子的路径。从孟子的分析来看，我们发现行仁义之事是如此的简单。如果杀害了一个无罪的人，那么就不能称得上是人。这里似乎在说刑法要公正。可见，所谓的“仁”其实是有公平的思想在内。而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去拿，这说明人们不动贪欲就能做到“义”。“义”即有克制自己欲望的含义。仁义结合来说，孟子认为士要做到对外秉持公正，对内克制欲望，那么就算是做到了居仁由义了。

所谓的“大人”是说致力于培养仁义之道这样的品质才算是大人^②，士人能够依照仁义这样的大事而行，那么士就可称为“大人”，也就是贤人了。即孟子所谓的“士尚志”就是要求士人以仁义为自身的事业追求，做到了这两点贤人君子的事业就完备了。并且孟子认为，与农民相比，士人有恒心。^③所以，对于士人来说，其道德要求同时也是他的事业追求，达到了道德要求也就完成了自身事业。换言之，士人是以修身为自己终身事业的。同样的，在论述怎样使自己安然自得时，孟子说：“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④这段话也正是说明士要能够以仁义为安身立命之本，如此才能怡然自得。并且不会随着境遇的改变而动摇自己的心志。所以即使是在不得志时贤人仍能保持自身修养，心怀道义；得志时则会主动施行道义，努力造福天下。如此才能称得上是贤人志士。

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孟子的思维逻辑。结合上述论说仁德时我们可以看到，人首先能孝顺父母，进而才有可能将亲爱之情扩充出去而有仁德。如果说孝是作为道德根基的话，那么，孟子这里所说的“尚志”就是一种功夫。也就是说要人能够依着仁义而行。这里的志更是一种道德意志力，是对仁义之道的坚守。依据于此，我们还可以想到孟子的养气说。在孟子看来，当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一定程度后，自己会有种难以言说的气场存在，孟子将其表述为“浩然之气”。在解释什么是“浩然之气”时，孟子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⑤孟子认为这种“气”很难表述的清楚。但是它具有很大的力量，以至于可以充塞天地之间，这就说明这种“气”已经超出了人的世界，与天地精神相连接了。于是人也就有了如同天地一般广大深沉的力量。而在说明如何集聚这种力量时，孟子认为要能够配“义”与“道”，而且还要能够持久的去行义，“义袭”即偶尔行

①（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36页。

②（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13页。

③（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6页。

④（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9页。

⑤（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5页。

义是达不到这种状态的。对这一点的要求就是说要“集义”，即人要一直秉持道义去行动才行。其实这也正是孟子所说的“尚志”，依仁义行而已。

孟子的尚志说规定了士人的行为规范，也是成为贤人君子的基本要求，所以说“尚志”也是孟子所认为的贤人的道德品质和基本要求。

2.2.3 射者“反求诸己”的形象

孟子既说明了人要能够做到孝，又说明了人要能够立志以依仁义而行。但是，我们仍旧可以想到，在一个人既能够孝悌又能够立志的情况下，如果他并没有达到自己所认可的修养程度，那么这就说明这个人做的还不够。孟子正是在此基础上要求人们要能够反思自己。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①

如果说上述的孝和志是个人自身内在道德品质的话，那么这里的“反求诸己”却是自己对自身修养状态的外在省察要求。孟子认为，自身德性见之于事最能反映自己的修养程度。就像射箭一样，如果射箭不中，那就要问问自己是否没有端正自身，而与他人是没有关系的。

孟子反省自身的思想与《论语·学而》相关：“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②在曾子那里，反省自己是十分重要的事，以至于达到了每日都要能够反省自身的程度。曾子认为忠信以及学习都每天必须要反省的内容。曾子素来不善言谈，但是他讲究向内反省的方法确实十分重要的，这成了儒家修身功夫的一大法门。而孟子反省观点即是取自曾子的思想。可见，曾子的反省思想给孟子带来很大影响。孟子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③孟子将反省的方面扩大，同时也是对自身处理各种事物的能力的一种检验。他认为如果自己去爱人但是并没有达到亲爱的地步，这说明自己的仁爱之心还不够，同样的，我们所做的任何事如果都没有达到效果，那么都需要自己反省内心。不过，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孟子所谓的反省是以内心的德性为根基，这对于每个人来说均是一样。所以，反省的功夫适合每个人。

孟子在“反求诸己”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诚”的思想。“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④孟子认为，自身随时都能够与万物相联系，只要自己能够自我诚心的反省，就会发现这个道理，内心就会富足，于是能够体会到快乐是无限的。而且让自己努力实行恕道，就能够很快达到仁德。可见，反

①（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22页。

②（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0页。

③（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60页。

④（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8页。

省自身也有着“诚”的要求。孟子甚至将这种“反身而诚”的思想与天道联系在一起。“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①孟子认为，天道没有人的思虑，它只是一个诚在；而人能够思虑，就能够体会到天道的诚。这表明孟子已经将天道和人道联系在了一起。孟子的天成了一个可以与人的德性修养相关的实体。这是孟子在人格修养上所做的重大贡献。同时我们发现孟子的逻辑推理很像《大学》所言的三纲领八条目。孟子从外向内推，以明乎善为止。可见，在孟子看来，明白人的善性是最基本的要求。孟子因此还与告子辩论过人性善恶的问题。而《大学》中所说的“至善”是将善性抬高，作为为人的终点。孟子则将善当作起点，与《大学》相比，孟子从人性上立论，更加简化了成圣成贤的步骤。所以从“反求诸己”到“反身而诚”再到“明乎善”，孟子一方面说明了贤人的一个道德品质为善于反省自身，同时也为普通人成为贤人提供了理论支持。

2.3 贤人的政治品质和基本要求

所谓政治品质，主要侧重贤人在参与政治生活方面展现出来的道德品质，这也可以称为臣德。虽然贤人可能不在位，但是在面对君主乃至整个政治状况所表现出来的德性品质，均可认为是其政治品质，亦可称为臣德。我们在论述这一方面时，也是通过孟子论说的人物形象来说明孟子的贤人观。

2.3.1 “不见诸侯”的形象

孟子认为，一个人要能够做到注重自己内心的道德修养，同时还要能够有展现自己道德主体的自信。这来源于贤人对自己内在德性的肯定以及由此而来的自尊感。在贤人面对王公大臣不合礼的召见时，孟子认为他应该果断的表示拒绝。对此，《孟子》全文竟然提到了三次这样的事例。

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②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③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④

①（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63页。

②（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46页。

③（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51页。

④（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01、302页。

孟子在这一形象上举了三个例子，分别是虞人、段干木、泄柳。这几个人很有特点，虞人是守猎场的小官，段干木和泄柳是不愿出仕的贤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见诸侯。不过这三段在具体论述时也有区别。第一段同时也是孟子解释自己不见诸侯的原因，但更偏重从义利关系上来说明。孟子认为贤人不会因为利益而行动，而是以道义来行动。如果因为利益行动，即便获得了很多的财富，但于行仁道没有任何帮助，这就违背了行道的初心，所以不可为。因为有利可图而做事，这是很多人做事的动机，即使是国君亦是如此。孟子游梁时，梁惠王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孟子是否能够有利于自己的国家^①。而孟子则以义利之辩来告诫梁惠王行仁义，这是要求君德。对于贤人来说，更是如此。孟子有取于这一点，所以不愿违背自己的初心而出仕。此处我们又不得不再说明另一个相反的形象，即被称为“德之贼”的乡愿。^②孟子认为，那些看似完美无缺却不能行尧舜之道的人，其实是伪善者，可以说是德的窃贼。试想，那些亲近国君的佞臣岂不皆是如此？他们同流合污，谋取利益，果真是小人，不能为贤人所容。

第二段和第三段意思类似，是从礼制的角度说明不见诸侯的含义。国君的尊位固然重要，但是国君如果不以礼节来召贤人，那么贤人是不应召的。这也可以说是以德抗位的表现。君臣之间固然要有等级，但在相处上是有一定的礼制的。正如齐景公用召唤大臣的旗子召唤小臣，小臣是坚决不会去的。因为这明显是有违礼制。可见，在这一点上，贤人心中的礼节不以国君尊位而转移。对于没有官职的段干木、泄柳来说，不见诸侯也是符合礼制的。如果国君主动要见诸侯，也要遵从贤人的意见，而不可任意而为。不见诸侯突出的是贤人的尊严，从侧面也说明了德重于位的道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大丈夫形象，贤人不会因为富贵、尊位而委屈自己，这是他们德之所在，他们始终坚持仁义之道，奉仁义而行。他们认为，只要自身坚守正道，才可能影响他人。如果自己屈德，那就把自身看小了，不可能再去纠正他人。

2.3.2 王者师的形象

孟子认为，在一个国家出仕就要能够达到出仕的目的。如果不能尽职尽责，那么就没有必要在这个位子上待下去了。孟子一方面说明贤人有着自己的出仕目的，另一方面也对自己的出仕情况提出要求。在孟子看来，贤人最应该做的就是能够成为王者师一样的人物。不过，所谓的王者师，必然是从指导国君入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谏言。甚至来说是，官职有高低，但是所从事的事务却无高低。孟子以一个管理监狱的小官为例来说明。

①（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7页。

②（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51页。

孟子谓蚺鼃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蚺鼃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①

这里孟子认为为官要尽职尽责，特别是言官，如果谏言不能为王者所接纳，那么就可以离开了。正如前面所说，士要尚志，即要志于道。而志于道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向国君进言，以劝其行仁政。这是儒家为臣思想的重要体现。孔子在鲁国不得志，周游列国长达十四年，其实也是在劝君行道。孟子效仿孔子，也在诸侯国之间游走，其目的就是希望仁义之道能够得到实施。这是孟子所谓的贤人天然的责任。《论语》记载学习优秀就可以努力出仕，而出仕了也要不断地学习。^②虽然孟子也主张如此，“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③但也认为“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④所以孟子主张贤人入仕一定要劝君行道，如果在朝廷供职但是国家却没有行仁道，那对于自身来说就是一种耻辱。孟子多次谈到如果贤人不能为国君所用就应该离去的情况。如孟子到齐国去，多次对齐宣王进谏，但是齐宣王不能采纳孟子的建议，孟子对此很失望，就离开了齐国。

孟子眼中的贤人是要行仁道的，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劝君行仁道。当然，如果国君有错，也要及时对国君进行劝谏。此时孟子所谓的贤人已经不是一般的志士了，而是有着成为王者师的能力。孟子认为，仁道必会得到推行，只要国君愿意施行。而作为贤人，必也会取法于王道之政，引导国君推行王道，此时之贤人即可名为王者师。孟子常常以子思为例，认为子思是一位大贤，在德行上鲁缪公要尊其为师。假如鲁缪公愿意推行仁政，那么子思一定会帮助他。孟子自己也是如此，孟子认为在其时天下已经很混乱了，如果想要让天下安定下来，自己一定可以做到。不过这需要国君的配合。孟子认为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⑤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股肱之臣正是这个意思。贤人不仅德行好，而且还要能够辅佐国君治理国家。贤人通过一方面劝谏国君改正错误，一方面引导国君施行仁政，这正是他发挥作用之处。孟子认为贤人如果能够成为王者师，那么国家就会出现崭新的面貌。

2.3.3 孔子“圣之时者”的形象

如果说一个贤人既能够挺立自己的道德尊严，又能够在职位上尽职尽责，但是我们仍旧需要注意的是，儒家还有一项重要的德性是哪怕圣人也难以做到的。那就是中庸之德。中庸之德对于贤人乃至圣人是十分高的要求，但是这表示了儒

①（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28页。

②（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7页。

③（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48页。

④（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00页。

⑤（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71页。

家提倡中道，不管是在出仕亦或自身修养等问题上，能够做到中庸，那么就算是一种难得了。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①

在讨论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对待出仕的态度时，孟子认为孔子的行为最值得效仿。伯夷选择等待天下清静的时候出仕；伊尹不管天下是否治乱，主张主动出仕，以尧舜之道治理天下；柳下惠不以环境好坏为虑，坚守自身的高洁，同样选择主动出仕；孔子与他们相比，则更加讲究中和，随时而变，能够行道的就行道，不能则止。孔子的时中态度是孟子十分赞赏的。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都是圣者，他们的行为各有其法，但是在济世救民上面却有共通性。孟子作为孔子的私淑弟子，更加果断的选择孔子之道，即在出仕问题上要能够进退有法，尽力做到让尧舜之道能够得到施行。所以，孟子这里所提到的圣贤的品质，主要在于在出仕问题上能够像孔子一样与时偕行。不过我们还要说明的是，孔子与时偕行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他所践行的中庸之道。

孟子认为伯夷、伊尹、孔子都是古代的圣人，自己比不上，但是如果要选择一学习对象的话，孟子愿意学习的是孔子。^②我们细观《孟子》全文，就能体会到，孟子仰慕孔子的是他的中庸之道。公孙丑向孟子抱怨，道那么崇高又完美，但达到它难如登天。为什么不让道下降一些以方便人们达到呢？孟子则认为顶级的匠人不会因为笨拙的工人改变绳墨的标准，正如羿也不会因为笨拙的射手改变弯弓的标准。君子教人如同教人射箭一样，只是做好标准的样子，剩下的就需要学生自己努力了。^③孟子进而认为圣人如同站在道的中间，有能力的人自然会跟从他。《论语》有类似记载，颜渊是孔子的最欣赏的弟子，他跟随孔子学习不可谓不努力。但他都喟叹孔子的境界难以达到，同样说明圣人之道难以企及。^④而结合孔子的上述表现，以及“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⑤我们说颜渊和孟子这里所要说明的道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孟子在其他地方强调人不能执一，要能够懂得权变。孟子在引导齐宣王行仁政时说到：只有将一个东西称一称才能知道它的轻重，把一个东西量一量才能知

①（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4页。

②（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7页。

③（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39页。

④（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6页。

⑤（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8页。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937064042104006030>